

第十四章

重点“大讨伐”和大逮捕

三江“特别大讨伐”

以1937年7月1日实施的行政改革，和紧跟着发生的“七七”事变为转折，伪满洲国的施政重点，转向为扩大侵华战争服务，特别是战时经济掠夺，但并未因此而削弱政治军事上的统治与镇压。实施后者是为了保证前者。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7月17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等，就国共合作问题举行了庐山谈判。9月22日南京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从此，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全民族抗日的新局面开始出现。这对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发生了巨大影响，在战略上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成了全国抗战的组成部分。当时，以东北抗日联军为主导的抗日游击战争正在掀起新的高潮，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更是火上加油。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中共吉东省委和北满抗联总司令部都先后发出文告或通知，号召全东北各阶层人民，实行总动员，支援抗日联军，响应中日大战，配合全国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傀儡政府伪满洲国，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繁荣。东南满、吉东、北满抗日游击区的人民群众，抗日救国热忱最为高涨。依兰、佳木斯、富

锦等地的许多知识分子和学生纷纷参加抗联。还有更多的人秘密组织或参加抗日救国会。据统计，仅汤原、依兰、桦川、富锦4县，抗日救国会和分会就发展到103个^①。1937年9月17、18日，汤原县抗日人民还举行了纪念“九一八”事变的大暴动。该县格区、龙区、鹤区等暴动群众，不但示威游行，散发传单，而且砍倒破坏了许多电杆和煤矿铁路。

按照关东军原定的1937年“治安肃正计划”，北满的“讨伐”镇压重点首先置于伪滨江省。因为伪滨江省是北满心脏，且系抗联劲旅——第三军的摇篮。尤其哈东5县^②，1936年起日伪即着手“特别治安肃正”，1937年正在紧锣密鼓加紧进行之中。就整个伪滨江省而言，在所谓“治本”方面，与其它各省相比，也是最为残酷的。^③然而，1937年下半年，日伪突将“讨伐”镇压的凶锋转向三江地区，开始了以“特别治安肃正”为名的三江“大讨伐”。导致此种骤变的事态是：抗日联军，除第一路军的第一、第二军外，其它各军均向日伪统治相对薄弱并与苏联隔江相望的北满、特别是三江地区云集。同年5月，还接连发生了如下几桩击痛侵略者的事件：一、5月4日凌晨2时，抗联第六军第三团约250名，从北部袭击了郑金店伪警察队，在离警察队驻地50米处构成包围圈，与伪警察队激战两个半小时始退。^④二、5月18日凌晨至天亮，抗联在地下工作人员的有力配合下，非常

① 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01页。

② 指双城、阿城、宾县、珠河、五常等县。

③ 以“集团部落”为例，至1937年伪满共有10644个，其中伪滨江省为3384个，占31.7%，大部分为1937年所建，该年即建2167个。

④ 1937年5月5日河村部队本部河本参匪情第29号。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文档案抄件，公390，6—27。

漂亮地夜击汤原县城成功。18日1时，抗联部队集结在汤原县城墙北100米处之后，灵巧地用钳子切断3道铁丝网，然后分路进击，第一枪是在东北门警察分驻所打响的，迅即突入伪县公署。当时，在伪县署外驻有伪军伪警120人。但因从北门攻入的抗联部队，分数路对伪警务局、拘留所、日本人宿舍、弹药库、总务科、监狱等一齐攻击，先发制人，特别是对日本人宿舍，用两挺机枪交叉射击，致使日伪束手挨打，毫无还手之力。抗联的另外一路还以各望台为据点用轻机枪和步枪对外进行威胁性射击，致使日军和县游击队明知是抗联来袭，也却步不前。抗联撤退前将伪法院点燃，火光将黑夜照得通明。此役共击毙斋藤巡官等8人，重伤3人，其中官北县参事官不久死去；解放被关押者75人；使敌损失：迫击炮3、轻机3、步枪30、迫击炮弹96、步枪子弹3.5万、马35。脱狱者大部分加入抗联。^①三、5月27日晚10时，抗联第六军军长戴鸿宾率骑兵200余名，突然袭击了依兰西湖景自卫团，将30余名团员缴械。戴鸿宾率部占领自卫团后，还给10里以外的依兰县第一区三嘴子警察分驻所华巡官打了电话：“最近将去贵地，请准备粮食，门前迎接”。^②

三江“特别大讨伐”的策划者和指挥者是日本头号战犯东条英机，他当时任关东军参谋长。在部署这场大屠杀时，他兼带恐惧与恼怒地声称：由于各地都已进行“讨伐”和“肃正”，抗联“逐渐向三江省聚集”，并“与共产党地下工作相配合”；1934

① 1937年7月8日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中警委第294号通报。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文档案抄件，公，390，6—27。内应的地下工作者为8名伪警察，即曲某、徐宝山和王振龄。据《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载，攻打汤原的是抗联第六军300人。

② 1937年6月4日牡丹江警务统制委员长代理致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委员长杜函，警委第377号。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日文档案抄件，公390，6—27。

年谢文东曾率农民起义，如今农民不仅与抗联“声息相通”，且受其领导，居民中与抗联“有血缘关系者甚多”；所以，伪三江省“匪民身分不清，界线混淆”，共产党“统治区域，甚为广阔”，土地肥沃，易于解决给养，还靠近苏联；对三江地区的“三万朝鲜人”也深感不安，本来由于移民政策的实施，在朝鲜人中间已呈现动荡不安之兆，更何况朝鲜人中“有很多是共产主义、民族主义者”，对伪军和自卫团更不放心，因为其中不仅“有畏惧共匪者”，“而且还与匪相通”，“借口保命供给共匪武器弹药”，“多次引导共匪袭击警察署。”总之，在东条英机看来，当时的伪满洲国还有大约一半的地区不“理想”，即还未确立殖民统治，三江地区尤为具有“特殊性”。为了给“将来实行根本的肃正”、即彻底的统治镇压作准备，和推行“重要国策”、即移民政策（这里是日本帝国主义最重要的移民地区），关东军决定“增加日军，加强讨伐威力”，实行带有“浓厚军事管制色彩”的“治安肃正新方式”。^①

1937年6月11日，关东军司令官发出关作命第995号命令。当时三江地区被划定为关东军的东北防卫地区。^②按照上述命令，第四师团主力被派至该地区，第四师团长任东北防卫地区司令官，而将原驻该地的第四独立守备队移至牡丹江地区。“讨伐”重点是三江地区西南部，即汤原县东南部、桦川县、依兰县、勃利县及方正县东北部，也就是邻近北满中心——伪滨江省的

① 1937年6月11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在传达九九五号命令的会议上的讲话。《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366~373页。

② 当时划分为5个防卫地区：东北防卫地区，即三江地区；东防卫地区，即牡丹江地区；中防卫地区，即牡丹江以西和哈东地区；东南防卫地区，即吉林地区包括延边；南防卫地区，即安东地区和江南。

地区,特别是“距铁路沿线县城和主要城市约二日行程之地区”。所采取的战术是:“在以大规模分散配置的兵力束缚匪团行动之同时,迅速准确地搜集匪情,一旦发现匪团,适当运用另外准备的游击队,和上述分散配置之部队,迅速追击,彻底消灭。”^①另外准备的特设游击队,共为9个独立中队,他们来自第二、第四、第十二师团和第四、第五独立守备队,每队100~150人。^②战术还规定,在重点“讨伐”地区,“特别须以有力攻势”破坏抗联的根据地;而在兵力薄弱地区,“须以强有力的攻势消灭匪团”。自不待言,在进行武力杀伐的同时,还要辅以所谓“治本工作”和“思想工作”。

三江“特别大讨伐”与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不大相同,关东军主力师团直接上阵,大规模的高度分散配置,实行带“有浓厚军事管制色彩”的武力镇压。但也还是“照顾”伪满洲国的所谓“独立国家”的外形。为此,伪满特把在东边道独立“大讨伐”中担任名义司令官的伪满第一军管区司令官于琛燾调任为第四军管区司令官,并实行军政统一,兼任伪三江省长。^③伪治安部高级顾问大迫通贞大佐兼任第四军管区和三江地区主任顾问,实际上,伪军主要由关东军专门从事策划“讨伐”抗联战术的北部邦雄中佐指挥。伪军投入三江“特别大讨伐”的兵力,除第四军管区的1个步兵旅团、两个混成旅团和步、骑各1个团外,还有

① 1937年6月11日关作命第995号命令附件《昭和十二年七月至十三年三月 东北防卫地区治安肃正计划要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365~366页。

② 1937年7月16日关作命第1063号附件《昭和十二年第二期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要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230~233页。

③ 第四军管区司令部设哈尔滨,伪三江省为其辖区,原司令官为郭恩霖。伪三江省长原为金名世,调任伪热河省长。

第二、三军管区的部分部队，以及靖安骑兵团和兴安骑军支队等。这数以万计的伪军统归关东军东北防卫地区司令官、第四师团长山下奉文指挥，他们主要担任江东地区的“讨伐”，划分为罗绶、抚饶、宝清、贤集等4个小区。^①显而易见，伪军承担的是非重点地区。

三江“特别大讨伐”，“以治标为其第一主义”，日军和伪军都实行高度地分散配置。警察也参加武力围剿，实行“大警察署主义”和“警察署中心主义”，伪警察队则增加到3500人。在武力追剿的同时，“综合实施治安肃正”，进行各种所谓“治本工作”。还仿照在哈东5县所实行的那种办法和模式，在方正县东部设立了“三道沟治安肃正办事处”，综合“治标”与“治本”。“治本”不但是三江“特别大讨伐”部署之一，而且也是当时全北满的“治安肃正”行动的构成部分。按1937年7月16日《昭和十二年第二期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要领》^②，1937年深秋落叶前，在伪三江、黑河、龙江、滨江各省，“治本工作”第一线须推至东起萝北县太平沟、经兴山镇、三道沟（汤原西方约二十公里）、凤山、铁骊、摇家店（绥棱东北方约三十公里），西到刘家店的一线，在线外也尽量建立“集团部落”。

“治本”的根本目的，在于使抗联等抗日武装部队入冬后无法与人民群众取得联系，断绝粮食来源，亦即达到所谓“匪民分离”的效果。所谓“匪民分离”，既在居住上分离，也还包括思想、

① 罗绶小区：主力为来自第三军管区的混成第十五旅和骑兵第二十一团，抚饶小区：主力是混成第二十三旅（欠1团）和靖安骑兵团，顾问牛方一角，宝清小区：主力为兴安骑军支队（欠1团）和步兵第30团，顾问为柿村中佐，集贤小区：主力为混成第二十二旅、第十七旅，骑兵第二十四团和宫越骑兵团，顾问为松田中佐。

② 《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230～233页。

职业方面的分离的措施。居住分离,主要通过归屯并户,强制建立“集团部落”,发放居住证明书,彻底实施《国境地区法》,严惩所谓“积极通匪者”等办法进行。思想分离工作包括:给日伪官吏打气;对各种团体进行“内部工作”,破坏思想方面的地下组织,组成流动性的“宣传、宣抚”工作班,建立固定“宣抚网”;加强第一线警察、自卫团“内部”,消灭其中的“通匪者和其他思想昏庸者”;建立协和会组织,等等。至于所谓职业分离,主要是警戒或禁止林业、矿业和渔业经营,特别是绝对禁止私种鸦片。为了切断抗联的粮道,不但划定大面积无人区,赶走居民,而且实行物品购买证制度,监视批发商和其他大批购买者的动向。总之,千方百计,妄图置抗日武装于死地。

活跃于伪三江省的抗联部队,涉及除第一、第二军外的抗联各军,也就是以赵尚志、周保中、夏云阶、李华堂、王荫武、谢文东等为首的各支抗联部队,1937年7、8月,为最高峰,达14000人。有这样一支强大的反侵略武装集团,转战游击于邻近苏联的重要战略地区,日本侵略者是寝食难安的,当然也就不遗余力了。关东军连对专业“讨伐”队——独立守备队都嫌不大中用了,所以特把他的野战主力师团之一的第四师团调来,以充作这场凶狂武力镇压的刽子手。而且,正当关东军调兵遣将付诸行动时,

“七七”事变爆发了,这就使三江“特别大讨伐”又具有排除后顾之忧的性质,倍加凶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和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开始,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更不能不用最大的力度抗击敌人,牵制敌人的有生力量。这便是三江“特别大讨伐”有别于前此历次“讨伐”的历史大背景。据日伪方面统计,从1937年7月“讨伐”开始,到1938年12月,抗日军被射杀7400名,被俘虏860名,被抓捕1480名,被诱扣2700名,

结果抗日军的总数从14000名减少到1200名。这一统计虽有夸大“战果”之嫌，但也反映了这场火与血的暴行的规模与凶残。同时期，光是伪警察、自卫团即出动“讨伐”2777次，累计达90562人次。如果加上日、伪军的出动“讨伐”，则为这一数字的“三倍”。^①按此数字计算，“讨伐”期间每天有10多股规模在500人以上的日伪军警在追剿和屠杀抗日军民。^②由此也反映出抗联等抗日武装打击侵略者的活跃程度。到1938年12月为止的整个“讨伐”期间，抗联出现几十万人次。

日伪在三江“特别大讨伐”中剿抚并施，后者即招降，它是瓦解抗日军的毒辣手段。他们实行的是所谓“特别招降工作”，由日伪警察宪兵进行，并有特务机关参加。策动的主要对象，是在抗日武装斗争大潮起伏中，随波逐流混入抗日队伍的意志薄弱者，和窃据领导的异己分子，后者尤为重点。日本侵略者这样干的目的，既是为了瓦解抗日队伍，也是妄图更多地逆用叛徒，强化其“以华制华”伎俩。有些被诱扣者即被编入专门从事潜入抗日军从事招降策反等活动的“讨伐”特设队。^③

言及三江地区日军招降纳叛阴谋时，炸死张作霖的直接杀手、关东军的东宫铁男的罪恶行径是必须要说到的。“九一八”事变后，其魔影始终游荡于三江大地，为推进日本移民而积极活动。“关东军的目标是要夺取北满地区的土地，代之而迁

① 此为伪治安部：《三江省治安肃正工作综合报告书》，1938年12月所载数字。引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400～401页。

② 另据1938年7月14日《新京日日新闻》报导，三江“大讨伐”过去一年间出动3304次，交战1242次，遭遇123742次，击死5470名，诱扣1131名。

③ 1938年7月22日佳木斯宪兵队长向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佳木斯第458号队，已招降472名，归农313名，一部分编入“讨伐”特设队。

入日本开拓团，使之完全成为日本的领土。在此基础上，建立军事基地，企图侵略苏联。”^①但结果却激发了依兰县土龙山农民暴动，暴动农民后来又进一步拉起一支以谢文东为首领的抗日武装，最后还被编为抗联第八军。东宫铁男于1936年12月着手诱降抗联第八军长谢文东。当时东宫系佳木斯特务机关长，兼任三江地区伪军顾问。为了进行招降，他还特别组织了以东宫公馆为名的特务组织，兵分两路进行活动。1937年2月，东宫等人经过策划，前往依兰县半截河子准备会见谢文东。与此同时，他们在依兰县八虎力逮捕了谢的母亲，并把东宫的走卒与谢的母亲、长子之妻和孙子等一同拍照的照片，谢母说的话，以及会面要求、条件等，交由半截河屯长送给谢文东，迫其投降，但未遂。三江“大讨伐”开始后，在依兰地区警备司令部顾问兼富锦特务机关长牛方一角指挥下，继续对谢的谋略。到1939年3月，谢文东终于投敌叛变。此后不久，抗联第九军军长李华堂也沦为日伪的走卒，中国人民的叛徒。

招降谋略是有重点目标的。伪警搜查班不同，他们配合日伪军的“讨伐”，在搜集情报的同时，广泛搜捕所谓“党团关系者、通匪通苏者和潜伏匪”。此类搜查班以伪警察署为单位组成，每县4~5个班。各县伪警务科设有特别搜查班本部和流动逮捕班，以统辖各搜查班。据统计，伪三江省各县搜查班，1937年7月至12月抓捕1938人；1938年1月至11月抓捕4054人。他们完全是滥捕滥杀。在上述逮捕人数中，1937年所谓“通匪”者和“其他”，各为508人和824人，两者合计占当年逮捕总数的66%，

^① 1954年9月15日白土五郎笔供。《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415~418页。

1938年这两者各为1098人和1688人，两者合计占当年逮捕总数的68%。至于以“严重处分”为名就地屠杀，这两年各为118人和124人。^①这些统计数字虽然道出了日伪军警滥杀无辜的罪恶事实，但却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三江平原制造腥风血雨的全貌。

在三江“特别大讨伐”中，协和会特别工作班的罪恶作用也不容忽视。根据伪三江省内抗日军的活动情况，日本侵略者认为“活用协和会特别工作班将有重大意义。”^②协和会特别工作班其活动“特别”之处在于，它以日伪军警武力为后盾，打入“匪团内部，谋杀匪首，扰乱共匪内部，搜集匪情，对共产党及抗日团体侦察谍报，逮捕”。不过“协和会特别工作班的主要目标，与过去相同，是匪首。”^③参加三江“特别大讨伐”的协和会特别工作班，1937年7月组建，1938年9月解散。一年间，他们在日本宪兵队的直接指挥下，共逮捕抗日军政人员407名，诱降635名，缴枪700支，弹药2000余发，马93匹。^④由此也不难反映出协和会特别工作班活动之猖狂。需要指出：这个特别工作班的头目，就是原间岛协助会会长金东汉，这个恶贯满盈的日本宪兵鹰犬，在三江“特别大讨伐”中，最后终于变成抗日武装的枪下鬼。

“四一五”与“三一五”大逮捕

自1935年起，日本帝国主义即明确地将武力“讨伐”的主要

① 以上数字均见《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389～390页。

②③ 1937年7月30日《日满警务机关一九三七年第二期治安肃正要领》，关宪作命第86号附件。

④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满洲共产抗日运动概况》，1938年部分。协和会特别工作班活动地区是：桦川、汤原、依兰、勃利、富锦。

锋芒指向抗日联军，而把政治镇压的重点目标置于中国共产党。后者称之为“思想对策”。1936年4月开始推行的“关东军治安肃正三年计划”要求，日伪警宪机关须配合军事围剿，肃清抗日武装活动地区，断绝其生路，迫使其“衰败以至溃灭”。并且将所谓“一齐逮捕”正式列为镇压办法与手段。从此，日伪警宪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爱国团体与人员的镇压，进入了更为疯狂的新阶段。继1936年的“六一三”大逮捕之后，1937和1938年又相继制造了规模更大的“四一五”和“三一五”对中国共产党的镇压事件。“四一五”大逮捕，“七七”事变前后正在紧张进行；“三一五”事件，实际是三江“特别大讨伐”的组成部分。

1937年4月15日，由日本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统一指挥命令下，各地日伪警宪同时一齐下手，大肆抓捕共产党人，此即所谓的“四一五”大逮捕。它是前此，特别是1936年一系列逮捕镇压事件的继续，并由此又导引出其它许多镇压事件，直到1937年11月，才暂告一段落。

1936年11月27日，磐石、伊通两县日伪警务机关根据从舒兰所获线索，出动近300人，在两县同时逮捕81名中共县委人员和所谓嫌疑者。继而1937年2月初，又第二次逮捕22人。两次逮捕的103人中，被认为“有共产党事实”的68人，竟有52人被处死。^①

与此同时，如本书第二编有关章节所述，自1936年7月起，山城镇地区警务统制委员会以破坏中共南满省委为目的，组成长岛特别工作班，以柳河五道沟为据点，采取“首先进行武装讨

^① 根据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1936年12月4日第450号通报，第一次逮捕的81人中，“严重处分”即就地枪杀者为48人。这里所说的52人被处死，是1937年2月9日中警第52号通报中的记载。实际上，多数是就地屠杀，而非判处死刑。另外后一通报还载，5人刑讯致死，5人送服苦役。

伐，然后再搜捕诱扣”的战术，持续破坏逮捕中共组织与人员，直到1937年春。^①

上述这些侦破和逮捕还都是分别进行的。1936年“六一三”大逮捕后，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在部署1936年秋季“治安肃正”计划时即已提出，在追击、讨伐抗日联军的同时，要对东北全部共产党组织进行统一侦破，不许各警务机关各自为政，个别活动。促成1937年“四一五”统一行动的是哈尔滨特委的暴露。1934年中共满洲省委遭到破坏后，党决定撤销满洲省委，代之成立哈尔滨特委和南满、吉东和北满3个省委。1936年初着手整顿党的组织，1月9日正式宣布撤销满洲省委，成立哈尔滨特委。这一年日伪白色恐怖虽已进入高潮，但对中共组织的全面情况仍不甚了了。1937年初，非但南满省委辖属的柳河县委暴露，而且由于哈尔滨宪兵队埠头分遣队抓得1名慑于白色恐怖的党内异己分子，暴露了交通线和哈尔滨特委，从而导致了“四一五”大逮捕。这一天同时遭到严重破坏的中共党组织有：哈尔滨特委、哈尔滨市委、奉天特委、磐石特委、哈东特委、下江特委，以及海伦、柳河等县委。作为“四一五”大逮捕的继续，是抚顺特支的严重破坏。1937年3月，奉天的日伪警宪将密探打入抚顺党组织，摸清情况后，10月4日上午到10月5日一举进行逮捕，共捕到31人，最后13人被处死，5人被判10至15年徒刑。被捕者多系伪县公署职员、小学教员和村公所职员等。到1937年11月，整个“四一五”

① 根据1937年5月19日伪中央警务统制委员会第214号通报所载：长岛工作班首先使党组织脱离红军的掩护，故于1936年10月诱降红军125人（这支队伍后来全被屠杀），然后又逮捕红军第五团和第一游击队22人。1937年1月29日，开始逮捕柳河县委人员，当天即逮捕了县委组织部长郭喜明等28人。2月12日，在清原县逮捕柳河县委书记冯剑英。3月9日至20日，又相继逮捕25人。

大逮捕，共有480余人被捕，是伪满时期日伪镇压共产党的最重大案件之一。

“四一五”事件尚未了结，1938年日伪警宪又进行了“三一五”大逮捕。此次镇压的主要目标是，中共北满省委、吉东省委及其下属的党组织和抗日救国会等。1936年9月，北满省委在抗联游击活动区汤原县四块石深山中正式成立，随即领导抗联第三、第六军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敌人，发展组织。1937年5月，抗联第六军奇妙地袭击汤原城成功。9月，汤原县4个区同时举行了纪念“九一八”的群众暴动。于是，惶恐不安的日本侵略者便将这里视为“满洲第一赤色地区”。关东军迫不及待提前进行三江省的“特别治安肃正”后，着令佳木斯日本宪兵队根据“特别治安肃正计划”，指挥协和会特别工作班和伪警特别搜查班，进行所谓“决死性的侦探培养”。而像纪念“九一八”的大规模群众暴动，也难免暴露党和抗日群众组织的某些情况。1937年8月，第四师团熊谷旅团仓石联队驻汤原太平川青田部队抓捕了所谓“通匪”嫌疑者何友三。交由警宪机关审讯后，10月26日汤原县委宣传部长尹洪明被捕。与此同时，经日伪宪兵特务软硬兼施，汤原县委组织部长周兴武和县委书记高春雨也先后被捕叛变。为了侦察党的外围组织抗日救国会的情况，敌人还曾煞费苦心收买、训练少年儿童，将他们化装成乞丐，潜入汤原县格区等这类抗日救国斗争比较活跃的地区。

当时，除小兴安岭密林地区到松花江两岸地区，即汤原、桦川、依兰等县，有北满省委及其下属党组织和抗日救国会外，吉东省委及其下属也活跃在南起绥阳北至同江的边境各县，两相呼应。而且，两个省委的活动地区犬牙交错。在依兰县双方就都设有县委。

为了策划和部署这场规模巨大、情况复杂的大逮捕，1938年3月8日，在关东宪兵队有关军官列席下，佳木斯宪兵队本部召开了日伪警务机关的联合会议。确定的方针和要领是：“实施对北满临时省委、吉东省委首脑机关党员和外围团体干部的一齐逮捕。”逮捕范围“只限于有可能逮捕的地区”，“如饶河、宝清、抚远、绥滨等地，暂不逮捕。”“主要目标是共产党上级组织和外围团体的负责人”，“对妇女只限于特殊情况，其他不予逮捕。”^①一齐大逮捕按地区的远近，分别于3月15日午前1时和14日傍晚开始的。对5县1市，分7区，派出34个逮捕班，出动警宪千余人。汤原、鹤岗两县还出动了日军。敌人预计，逮捕时有可能发生武装抵抗，故分别采取军警乘汽车急袭和逮捕班全员化装进击两种方法。结果，380余人被捕，部分破坏和全部破坏的组织有：特委1个，县委8个，区委18个，支部6个，区级抗日救国会10个。^②最后，有89人被判处死刑和各种有期徒刑。^③

抗联西进与日伪的继续“讨伐”

三江“特别大讨伐”于1938年12月告一段落后，伪三江省仍被列为“治安肃正”的三大重点地区之一，并居三者之首。1939年度的“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要纲”规定：“统一集中日、满军

① 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三江省地区“三一五”逮捕经过与实绩》，1938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8卷，“东北历次大惨案”，第180～181页。

② 这一被捕和被破坏状况，是根据中方档案资料。根据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三江省“三一五”逮捕经过与实绩》等载，为315人。

③ 伪司法部刑事司思想科关于“三一五”事件通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8卷，“东北历次大惨案”，第181～191页。

警各机关力量，彻底消灭在三江省、通化省和热河省一部地区的残存匪患”。^①为此，第四师团继续盘踞在三江地区，并指挥那里日伪军警，向抗日军民施暴。当时，三大重点“讨伐”地区，尤其在三江和通化两地区，都是以全力“捕杀”抗联各部领导人为主要目标，并妄图于1939年达到目的，其实是枉然的。

日伪进行三江“特别大讨伐”时，除抗联第一、二军在东边道，抗联第十军在五常坚持抗日游击战争外，其他第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一军等8个军都云集在三江地区。他们从1938年初起即开展反“讨伐”斗争，虽也取得一些胜利，但处境维艰，损失日重。为了冲破敌人的“讨伐”，和争取与战斗在南满的抗联一路军及挺进到热河地区的八路军取得联系，中共吉东省委决定，以抗联二路军第四、五军为主力进行西征。根据1938年6月29日第四、五军领导人会议商定的计划，西征部队混合编组，由3部分组成，共680人，统由吉东省委书记、第五军政治部主任宋一夫领导。西征开始后，还曾胜利地袭击了苇河县楼山镇。但是，当西征部队进入哈东地区后，不仅屡遭追击，而且给养枯竭。7月30日，西征领导人宋一夫携款叛逃。这个大叛徒，后来充任伪警佐，给抗日事业造成相当损害，是个十恶不赦的民族败类。宋一夫的叛逃虽给部队带来很大动摇，但李延平、王光宇等部队领导人，坚持按既定计划指挥西征。问题是，时至8月上旬，来自哈尔滨的日伪军，陆空联合，追围堵截，部队不得不于8月下旬分兵活动。当时只剩百余人的第四军远征队，曾谋求同战斗在五常山区的抗联第十军取得联系，第十军军

^① 1939年4月7日《昭和十四年度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要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234~235页。

长汪雅臣闻讯后也曾率部接应，但结果不仅未达目的，汪自身还负了重伤。9月下旬，第四军远征队又被包围，损失惨重。11月下旬，部队损失大半。最后，西征领导人李延平、王光宇还被叛徒袭击，先后牺牲。第五军远征队一分为二：一部分与抗联二军五师会合，转战于额穆、敦化一带，另一部分则返回第五军后方基地刁翎地区，但在返回途中，迫于敌人的追击，发生了著名的“八女^①投江”的悲壮一幕。

抗联二路军，除第四、五军主力西征外，其余部队，包括第四军留守处、第五军三师和第七、八军，在总指挥周保中的领导下，继续在三江地区与敌人进行艰苦而激烈的斗争。1938年6月，周保中在宝清召开会议，重新部署了所辖各军的反“讨伐”斗争。与此同时，第五、七军组成联合部队。1938年7月，吉东省委还决定成立下江临时党团组织，以统一领导活动于富锦、宝清一带的第四、五、七军工作。同年9月，周保中率抗联二路军总指挥部，由宝清向依兰、方正转移，下旬到达刁翎地区，在那里他们同第五军军长柴世荣及救世军王荫武部会合。但因敌人发现了抗联二路军总部行踪，又不得不向牡丹江岸莲花泡的山里转移。为巩固第五军，1939年1月，周保中于牡丹江柳树河子召开了吉东省委临时会议，揭露了第五军一师师长关书范的动摇叛变行为。抗联第二路军所属第七军，一部分战斗在虎林、挠河一带。代军长崔石泉曾于1938年9月下旬在挠力河打了一次成功的伏击战，击毙伪军日野武雄少将，给敌人以震动。1938年冬，第七军损失很大。除军长李学福病死于苏联外，第一师副师长姜克

① 她们是：指导员冷云，班长杨贵珍、胡秀芝，原第四军被服厂厂长安顺福，战士郭桂琴、黄桂清、王惠民、李凤善。

智和第三师政治部主任刘延仲先后牺牲。抗联第二路军所属第八军，拒不按总部要求参加西征，而在谢文东带领下潜入密林。这支本来成分比较复杂的抗日队伍，后来终于被日本特务的谋略所瓦解。军长谢文东、副军长滕松柏和师长秦秀汉、白自孚等都沦为可耻的叛徒。

与抗联第二路军并肩战斗在三江地区的由北满省委领导的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在敌人的疯狂的“讨伐”下，损失也很大。如抗联劲旅第三军，原辖10个师，1938年5月即已减员过半，故被整编为4个师。1938年5、6月，北满临时省委决定，为冲破敌人“讨伐”，跳出包围圈，组织北满抗联部队第三、六、九、十一军穿越小兴安岭，向西部海伦地区挺进，开辟新的游击区。参加西进的主力共800人，分8批行动。由第九军第二师组成的首批部队150人，1938年6月出发，11月到达海伦时仅剩20人，但抗联北满部队的西进最后终于成功。张寿箴及其战友们所留下的不朽诗篇《露营之歌》，是当时艰难历程的真实写照：“草枯金风急，霜晨火不燃”，“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他们却信誓旦旦：“精诚奋发横扫嫩江原”，“夺回我河山”。

北满抗联部队西进后，大约还有400人左右的留守部队，在三江地区坚持斗争。除此之外，原北满抗联总司令、第三军军长赵尚志，第六军军长戴鸿滨，第十一军军长祁致中等率部百余人由苏联归来，对日伪更构成新的威胁。赵尚志是1938年1月赴苏的，他应苏联远东边防军之邀代表北满省委抵苏后，却被监禁起来，继而入苏的戴鸿滨和祁致中等也遭到同样命运。1939年6月，他们获释归满，在汤原一带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并首战佛山县乌拉嘎金矿告捷，但在战斗结束时抗联名将祁致中却被错误处

死。以后赵尚志继续取得一些胜利，致使敌人对之忧心忡忡，草木皆兵。但因敌人封锁严酷，同年底赵尚志等重返苏联。

北满抗联主力部队陆续到达海伦地区后，1939年1月2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召开第九次常委会，决定将抗联第三、六、九、十一军编为第一、二、三、四支队和第一、二独立师。随即在黑嫩平原寻隙袭击敌人。1939年4月，北满临时省委又在通河召开省委第二次执委会议，决定以第三、六、九、十一军为基础，成立抗联第三路军。继而又成立了隶属于三路军的3个地区性指挥部：龙北指挥部，由新任抗联第三军长许亨植（后改为第六军参谋长冯治刚）任指挥，领导第二、三支队，活动地区为海伦、讷河、嫩江、德都、龙门、通北、克山、克东一带；龙南指挥部，由第十一军第一师师长李景荫任指挥，领导独立第一、二师和第四支队所属第九军第二师，活动地区为绥棱、庆城、铁力、绥化、木兰、东兴、巴彦一带；下江指挥部，由第六军第一师师长徐光海任指挥，领导留守部队在下江地区进行活动，但因徐光海牺牲，该指挥部实际未能成立。1939年5月，关东军制造了诺门坎事件，对苏战争开始，关东军的主力纷纷西调前线，从而给抗联三路军的黑嫩游击战提供了更加有利的形势。他们将山区游击战向更为广阔的平原地区推展。所以，在1939年夏季，抗联三路军在黑嫩平原，纵横驰骋，频繁袭击敌人的军事设施和据点。1939年9月18日，冯治刚率领的第二支队270多人还强行占领了讷河县城，给群众以极大鼓舞。1940年初，在苏方的斡旋下，吉东和北满两省委得以在苏联伯力召开联席会议。会后，冯仲云被任命为抗联第三路军政委，抗联第三路军也被改编：龙北部队改编为第三、九支队（第三支队长王明贵，第九支队长陈绍宾）；抗联第三军、第十一军各部合编为第六支队，张光迪任支队长；抗联第三军的

一部改编为第十二支队，支队长为戴鸿滨。各支队活动区域：第三支队——嫩江、讷河、德都、甘南、布西、阿荣旗、扎兰屯、景星，基地为德都朝阳山；第六支队——拜泉、明水、青冈、海伦、绥化、兰西、呼兰、通北，基地是东兴、庆城；第九支队——北安、通北、克山、克东、拜泉、明水，基地是通北县南北河；第十二支队——绥化、望奎、巴彦、肇东、肇州、肇源，基地是铁力、庆城。顺便指出，此时抗联其它部队也都已小部队化，且在苏联境内已建立野营，野营派回的小部队，配合在各地坚持斗争的抗联部队，不断袭击敌人。

抗联三路军之所以决定西进并取得成功，后来又得以在那里驰骋作战，固然与三路军自身善战有关，同时地理条件优越也是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以伪北安省为中心的黑嫩平原，介于大小兴安岭之间，是号称北满宝仓的沃野。其北部虽不如伪三江省那样易于活动，但因靠近苏联，敌人武力“讨伐”时，可以躲进山林或入苏，而当需要粮秣给养时，则可求之于平原沃野。在政治上，这一地区恰系日伪统治的薄弱环节。日伪称，这里“民心极度不安，给匪贼以可乘之机”，“村落的自卫施設等都未曾实施”，“警备力素质低下”，“从未把握民心”，“几乎没有群众组织”。^①所以，继东边道、三江地区之后，黑嫩平原居然成为抗联武装游击区，是不无原因的。

黑嫩平原和三江地区的地位相同，都是关东军对苏备战的重要战略地区。抗联的游击活动，直接影响着关东军对苏备战计划的推行。何况当时的抗联游击活动已在相当程度上以苏联为依

^① 伪治安部参谋司农田事务官：《北安省地区治安肃正献策》。1940年8月2日齐齐哈尔宪兵队长星实敏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竹内宽函，齐宪高第317号。

托。特别是1939年伪满洲国开始推行所谓“三大国策”之一的北边振兴计划后，以伪北安省为中心的黑嫩平原，和伪满东部的伪东安省一样，成为接近第一线地区的加紧兵站基地建设的第二线地区。在这样的地区内，竟有抗联三路军的几支劲旅，纵横征战，对日本侵略者来说，不能不认为是心腹之患。但是，由于抗联部队业已小部队化，作战异常机动灵活，又十分隐蔽地寓于群众之中，所以，日伪军警都“避免大兵力的一阵风似的讨伐”^①，而是用少数部队进行捕捉性的长追作战，并与政治上的血腥逮捕镇压密切结合。无论是三江还是黑嫩平原，都是如此。

前面已经提到，自1939年4月起，冯治刚所领导的抗联三路军二支队，即辗转于北安、德都、讷河等地，频频袭击敌人。特别是同年9月18日，二支队270人，在当地人民配合下，攻克讷河县城。为了“讨伐”抗联二支队，在嫩江和北安地区日军部队出动同时，在伪龙江省警务厅长渡边兰治命令下，讷河和甘南两县伪警察队出动300人；伪北安省警务厅长也命令冈野警察队120人参加“讨伐”。但是，日伪军警的“讨伐”是徒劳的^②，根本未见二支队的踪影。于是日伪警宪向广大群众寻求报复，第二年制造了下面即将述及的讷河事件。

以王明贵为首的（改编后）第三支队也是抗联三路军的善战劲旅之一。它以德都朝阳山为后方基地，活跃于嫩江、讷河、甘南、布西、阿荣旗、扎兰屯、景星一带。1940年9月进行了攻打克山县城的著名战斗。继而又进行了著名的霍龙门战斗。然后于

① 伪满治安部：《康德八年度治安肃正指示》，1941年1月10日。

② 1939年末冯治刚率120名骑兵过嫩江入伪兴安东省布西、巴彦旗、阿荣旗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940年2月4日在阿荣旗三岔河上游任家窝堡与日伪军作战中，冯治刚牺牲。他是屡建战功的抗联名将。

1941年1月全支队渡黑龙江入苏休整。3月重返东北战场。到达爱辉县后，6月23日袭击了罕达气金矿。转到阿荣旗后，8月25日攻克了阿荣旗震威庄的伪警察署。这场走出山林在平原进行的战斗，直接威胁了昂昂溪至满洲里这条唯一的铁路交通线。因此，日伪军警对三支队开始了疯狂的“讨伐”。驻昂昂溪日军防卫司令官岩佐少将命令所属部队300名；伪龙江省警务厅长神子勇命令所属伪警察队430名；伪军第三军管区所属部队150名；加上伪兴安东省警务厅长安藤贞夫和齐齐哈尔伪铁路警护队本队长山田英二所派出的队伍，共1千数百人，即10倍于三支队的日伪军，对三支队展开围剿。使三支队受害最大的是，关东军驻海拉尔特务机关操纵的以鄂伦春族为主体的一支由70余人组成的特务谋略部队。该队由特务机关员铃木喜一少尉指挥，故称铃木“讨伐”队。他们把三支队最后包围在呼玛县苦楚河边，造成三支队102人的巨大牺牲，只有16人冲出敌阵，转移过程中又有5人牺牲，到达苏联时只剩11人，其中包括支队长王明贵和宣传科长陈雷。

抗联三路军其他支队的情况是：第六支队以庆城凌云山为基地进行游击活动；第九支队以通北县南北河为根据地进行活动；活跃于三肇地区的第十二支队，遭到敌人大规模“讨伐”，特别是代支队长徐泽民被捕后，向第六、九支队靠拢，最后划归第六支队领导。而第六、九支队活动的地区，是哈尔滨至黑河铁路贯穿其间的伪北安省，军事战略意义重大。自1939年末抗联三路军威胁、袭扰滨黑铁路后，驻北安的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安藤中将和伪北安省警务厅长大畑苏一，即指挥日伪军警加紧进行“讨伐”。伪北安省的警察队也从3000余人增加到5000余人。步入1941年，第六、九支队处境更加艰难。青纱帐起的夏季虽取得一些战果，但到了9月转战讷河、远征嫩江的第九支队便遭致严重挫折。9月

20日，在伪兴安东省莫力达瓦旗，第九支队遭驻昂昂溪的日军田中部队白九队包围，支队参谋长郭铁坚等20余人牺牲。而且，从郭铁坚身上还搜出了有关材料，结果导致了以“田白工作”为代号的逮捕100余人的血腥镇压惨案。在这种情况下，1941年11月，第六、九、十二支队主力，由于天放带领赴苏休整，只留下两支小部队坚持斗争：一支以第十二支队长朴吉松为首的10余人继续在庆城、铁力一带活动；另一支张瑞麟等六七人在巴彦、木兰、东兴一带活动。两支队伍统由抗联三路军参谋长许亨植领导，虽人数有限，但在发动群众进行抗日救国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组织领导作用。因而敌人把他们看成眼中钉，急欲拔之而后快。

讷河事件与三肇惨案

如前所述，1939年9月18日，冯治刚率领的抗联三路军二支队约270人，由预先派出的联络员引路，以高粱地为掩护，夜袭讷河县城成功，占领县警务科，冲破监狱，解放囚人100余名，夺取了武器，打死了地方警察学校的日本人主事，从而在黑嫩平原上，使日伪遭受一次沉痛打击。当时讷河县城城墙相当坚固，警戒森严，伪县公署周围还没有电网。但抗联二支队所派联络员已做好侦察。夜袭时利用高粱地接近城区；一路在城内牵制日本守备队，另一路越城墙奇袭伪县公署。第二支队此次攻城胜利，是和讷河人民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分不开的。从1939年初起，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讷河县内的部分村屯群众就开始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因此，第二支队不但攻城时备受群众欢迎，主动撤离时，沿途也受到各地居民的热烈欢送，有的村屯小商贩还有组织

地慰问了抗联支队。于是，日伪一面追击二支队，一面对百姓进行血腥报复。在该县五区龙河村抓捕40余名群众，并于同年农历10月28、29日，将其中的22名以“私通红军”的罪名，枪杀于讷河县城的北门外和西门外。从此讷河县被划为“匪区”。齐齐哈尔日本宪兵队指挥日伪警宪，经过大约半年时间的秘密侦察后，1940年9月和12月，先后两次以“通匪济匪”罪名，在讷河各地逮捕142人。^①第一次96名，第二次36名，两次共有52名于1941年6月和12月被送到伪龙江高等法院惩处。在这些普普通通的中国百姓身上，日伪警宪特们表现出了他们所独具的残暴本性，他们施用种种奇特酷刑——诸如，点燃成卷报纸烧身；用夹板夹太阳穴（夹板上安装两个木头疙瘩）；用开水烫；用卷烟头烧，等等，以致活活刑讯致死3人。

三肇事件与讷河事件几乎同时发生。三肇，即肇东、肇州、肇源（即郭尔罗斯后旗），邻近北满统治中心哈尔滨。抗联三路军为把利刃插入敌人心脏，在日伪眼皮底下开辟游击区，1939年6月把第十二支队^②派往三肇地区。党的组织也相应地成立了龙江工作委员会，即三肇地区工作委员会。而饱受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掠夺之苦的三肇人民，对于仰慕已久的抗联的来临，表现出了极大的爱国热忱。许许多多普普通通的人很快便给抗联以各种支持，积极参加抗日救国会的斗争。因此，活跃于三肇地区的第十二支队，如鱼得水，钻进敌人心脏，打得淋漓痛快。从1940年9月12日首战肇州丰乐镇，到12月21日徐泽民率队袭击安达兴安

① 此为日伪警宪机关的统计数字。据当时群众揭发和有关战犯、汉奸、特务交待，共逮捕230余人。

② 第十二支队长原为戴鸿滨，因其携款离队，从1940年9月下旬起，由徐泽民代理支队长。

农场，在3个多月里，就进行了8次完全胜利的袭击。^①就在敌人眼前把他们的坛坛罐罐打得稀里哗啦。特别是11月8日对郭后旗肇源街的袭击，使敌人胆战心惊；攻入伪旗公署，杀死日本人警察官7人，夺取枪支296支，释放囚人29人，焚毁监狱和伪法院、检察院，还在城内十字街口召开民众武装起义大会，砸开日清粮栈，分配粮食给群众。抗联第十二支队的军事斗争胜利亦非偶然，三肇地区党的政治工作和群众抗日斗争的组织化发展很快。当时，3县已建立区委4个，小组5个，抗日救国会9个，妇女部1个，武术团2个。

面对三肇地区抗联和群众迸发出来的如此高昂的抗日斗争精神，日伪当局极为震惊。稍稍冷静之后他们发现，在这种平原抗日游击战中，除有组织的活动外，还广泛地存在着“完全自发性的积极的通匪活动”^②，从而更加剧了其内心的恐惧。出于法西斯殖民统治的需要，日伪悍然“实行必罚、严刑主义”。^③所以，从三肇事件起，日伪镇压政策，血腥气味更为浓重，不单对共产党人，而且对于倾向和投身于抗日救国的广大群众，也开始大规模的杀戮。这也是继“四一五”和“三一五”之后，日伪镇压政策十分明显的新趋向。

敌人不迟钝。1940年8月19日1名共产党员被捕叛变后，伪滨江省警务厅和三肇以及邻近的安达、青岗、兰西等县立刻编成

① 9月12日100人袭击肇州丰乐镇，11月8日70人袭击郭后旗肇源街，11月9日102人袭击郭后旗头台村，11月16日60人袭击肇州托古村，11月21日80人袭击郭后旗古鲁站，12月7日200人袭击肇州明村，12月11日180人袭击郭后旗大官村，12月21日200人袭击安达县兴亚农场。每次袭击都捣毁伪警察所、伪村公所等，并夺取枪支，以壮大自己。

② 此为被破坏的组织状况。见1941年9月9日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关于三肇事件起诉书，哈高检思密第752号。

③④ 1941年6月30日伪哈尔滨高等检察厅关于三肇事件处理情况的报告，哈高检思密第180号。

总部设在肇州的特别搜查班。第十二支队打响后，特别是11月8、9日袭击郭后旗肇源街和台头村后，日伪军警随即转入公开的逮捕与镇压。及至1940年12月9日，以大迫通贞中将为司令官的滨江地区司令部更炮制了《三肇地区讨伐计划》，动员关东军子安部队主力，伪军刘兴讨伐队和伪警察队，以三县一旗，即肇东、肇州、安达、郭尔罗斯后旗为范围，以肇州和郭后旗为重点，构成本部和主力设在肇州县城，其它各设一部，划分地区，各方均可随时出动“讨伐”的态势。与此同时，由伪治安部、第四军管区、滨江省警务厅、协和会和宪兵第四团等，还组成了所谓治安工作委员会。于是，一场围剿抗联第十二支队、镇压三肇抗日群众的白色恐怖风暴，很快席卷三肇平原。

抗联第十二支队和三肇抗日群众，始终与日伪针锋相对，英勇不屈。1940年12月下旬，支队长徐泽民还曾亲自打电话给肇州县城伪警察署长劝降。^①但在1941年2月13日晚，徐泽民和第十二支队参谋长李忠孝便于兰西县临江村丁家油坊被捕。此时，日伪警特已在三肇及其周围地区搜捕了近300人。日本侵略者已红了眼。当1940年11月8日第十二支队首袭郭后旗后，伪滨江省警务厅特搜班立即前往镇压，按关东宪兵队命令，11月9日马上把19名被“认为是袭击时的通匪者”“在郭尔罗斯后旗南方松花江上做了严重处分。”^②即塞进冰窟窿之中。日本宪兵队承认，当时“未能详细查核，不免有若干捏造”。^③为了对中国抗日军民进

① 哈尔滨宪兵队本部：《三肇地区治安紊乱前后经纬与肃正工作进展状况》，1940年12月。

② 1941年4月1日哈尔滨宪兵队关于三肇事件大逮捕的报告，哈宪高第335号。

③ 1941年4月4日哈尔滨宪兵队长致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关宪高第220号。报告附有19人名单。另有资料载，还有1名目击者也被塞进冰窟窿中。

行兽性报复，他们肆意大量屠杀无辜。对其他被逮捕者，也实行所谓“果断的处理”。为了威慑群众，“显示法律的威力”，哈尔滨伪高等法院的特别治安庭，跟随日伪军警“讨伐”队到三肇现地开庭，随捕随判。据日伪统计，如下表所示，最后有175人被判处各种刑罚，其中72人被处死，这不包括上述19名被“严重处分”者和其他被任意杀戮者。当时，在三肇地区，杀气腾腾，满沟站等地都悬挂着被屠杀者的人头。实际上，在三肇惨案中，群众所遭受的劫难是难以计数的。日伪军警在追剿第十二支队过程中，只在四撮房、敖木台、黑家窝棚等地，即屠杀抗日军民100余人。可三肇惨案只是伪满末期日伪在北满大地制造的一连串杀害大批群众的大血案的序幕。

三肇事件被判处者统计表

	死刑	无期	10年	7年	5年	3年	2年	计
肇 州	32	20	21	1			5	81
肇 源	40	20	17	2	3	5	7	94
	72	40	38	3	3	5	12	175

资料来源：哈尔滨伪高等检察厅关于三肇事件处理情况报告，1941年6月30日。

野副“大讨伐”

1936年秋至1937年春，日伪在东边道曾进行“特别治安肃正”和伪军“独立大讨伐”，但未达到预期目的。由第一、第二军所组成的抗联第一路军，南起安奉铁路沿线，北到牡丹江的绥宁地

区，在漫长的抗日游击战线上，仍然活跃地打击日本侵略者。自不待言，盘踞这一地区的关东军第一、二独立守备队和伪军第一、二军管区所辖部队，也在定期、不定期地继续进行“讨伐”。而且，由于日伪“治标”、“治本”并举，抗日游击区不断缩小。在这种形势下，1938年初，抗联第一路军总指挥做出决定，抗联第一军由桓仁向辑安老岭山区转移，争取与第二军会师，2月开始行动。在转移过程中，杨靖宇还率部进行了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该隧道是当时正在修建的通化至辑安铁路的关键工程。抗联第二军活动地区比较广泛。其教导团和独立旅活动于金川、濛江一带；其第五师则在宁安、敦化地区打击敌人。1938年4月，中共南满省委书记、抗联第二军政委魏拯民率部来到辑安，与杨靖宇的第一军会师。5至6月还举行了第一次“老岭会议”。会议决定组织西征，由第一军第三师先行，第一、二师随后行动。同时鉴于王德泰已经牺牲，会议决定由魏拯民兼任第一路军副总司令。会后，杨靖宇和魏拯民还组织指挥了伏击前来“讨伐”的伪军索景清旅的战斗，给敌人以很大杀伤。正当此时，抗联第一军第一师长程斌叛变，形势为之一变。1938年6月，专门从事策反、逼降的日本宪兵长岛工作班80余人，在本溪将正在准备西征的抗联第一军第一师长程斌等人包围，一方面答应保全其生命，将其所属改编为伪满武装部队，一方面派其他叛徒到伊通将程母和兄捉来，迫令她们向程劝降。最后，程斌终于在本溪碱厂新宾集投降。程斌及其所属正式投降后仅8天，1938年7月即被改编为伪警察队，在日伪警宪控制下组成工作班，分赴各地搜捕杨靖宇、魏拯民等抗日将领。当时，日伪军警的小头目曾坐着飞机指挥叛徒程斌等，向抗联队伍喊话劝降。后来的历史事实表明，叛徒程斌及其一伙，给中国人民的神圣抗日事业造

成很大损失。抗联第一路军总部鉴于程斌叛变不但急剧恶化了本溪、桓仁、宽甸一带的形势，而且暴露了抗联第一路军的军事秘密，不得不另做他图，重新部署。根据1938年7月紧急召开的第二次老岭会议决定，取消了西征计划，并将主力从老岭向金川河里地区转移，同时撤销第一、二军番号，在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部统辖下，将其改编为3个方面军和1个警卫旅。警卫旅由总司令部和杨靖宇直接领导，活动于金川、濛江、辑安一带。第一方面军，1938年8月于金川黑瞎子沟编成，原为第一军第二师，指挥曹亚范、政治部主任伊俊山、参谋长尹夏太，约250人，活动于辑安、临江、通化、金川、辉南、濛江等地。第二方面军，1938年11月于濛江南排子地方编成，原为第二军第六师，指挥金日成、政治部主任吕伯岐、参谋长林水山，约350人，活动于长白、抚松、濛江、临江、和龙、安图、延吉、珲春、汪清等地。第三方面军，1939年9月于敦化汉阳沟（今安图县境）编成，原为第二军第四、五师，指挥陈翰章，副指挥侯国忠、参谋长朴德范，约300人，活动于延吉、汪清、珲春、敦化、额穆、蛟河、宁安、五常、舒兰等地。^①抗联第一路军的这些部队，尽量躲开敌人“讨伐”锋芒，主动出击痛袭敌人。如杨靖宇亲自指挥的警卫旅和少年铁血队于1939年4月一举攻入敦化县内重镇大蒲柴河镇，解除百余名伪警武装。1939年2至5月，第一方面军在辑安境内的花甸子、土城子、青石沟、台上、横路等地进行10余次战斗。第二方面军，在金日成领导下，不仅在长白山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而且曾向朝鲜茂山地区进击，推动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

^① 参见《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斗争史》，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35页。

争。在第三方面军编成前，坚持在敦化、额穆、宁安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的抗联第二军第五师，在陈翰章指挥下，1939年7月初，还曾袭击了镜泊湖水电站北湖头工程地区，焚烧了工程事务所，解放了大批劳工。

关东宪兵队统计，1939年初，抗联第一路军还有1800人，杨靖宇直属部队500人，下属部队1300人。按关东军1939年的所谓“治安肃正计划”，通化列为8个重点地区之一，并以“捕杀”抗联领导人为首要目标，拟于同年底完成“讨伐”。为此，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于1939年4月决定^①，将“讨伐”重点指向桦甸、敦化和额穆岭东地区，并以杨靖宇（包括金得范、崔贤、方振声、全光）和陈翰章为目标，“至迟在今年六月内完成”“治安肃正”。手段是，日军、伪军、伪警分别组成所谓挺进队，进行追击。其中，伪警通化富森队，就是程斌叛徒警察队。然而，历史发展的逻辑是不以侵略者的意志为转移的。欲以短短两个月的时间达到所谓“捕杀匪首、灭绝匪根”的目的，无异于白日做梦。1939年6月24日，敦化县三岛副县长伙同伪吉林省警务厅西濛警备科长等人，窜到敦化南黄泥河保安村，向抗联领导人崔贤诱降，结果诱降者悉被击毙。^②这一事实，标志着日伪“讨伐”计划的失败，也反映了抗联仍旧是给日伪以巨大威胁，是其日夜难宁的反抗力量。但是，日本帝国主义急欲从武力“讨伐”中抽身。特别是由于爆发了越陷越深的诺门坎战争，和激变的欧洲风云终于导致欧洲战争，日本侵略者不惜孤注一掷，妄图解脱后顾

^① 1939年4月18日《第二独立守备队作战命令》，二独司作命第376号。《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240页。

^② 同年12月，当时野副“大讨伐”已经开始，陈翰章还率部袭击了蛟河县城，打得日伪情头转向，不知所措。

之忧。另外，随着战时经济掠夺的加剧，东边道地区作为钢铁、煤炭和森林等资源品的供应地，也日趋受到掠夺者的青睐。

野副“大讨伐”正式开始于1939年10月。因“大讨伐”的指挥者是关东军第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兼东南防卫区司令官野副昌德少将，故称为野副“大讨伐”或“东南部治安肃正”；又因此次武力围剿行动是伪吉林、通化、间岛三省日伪军共同行使的，也叫作“三省日满军联合作战”。“讨伐”地区是：伪通化省的抚松、濛江、长白、通化、金川、临江；伪间岛省的安图、延吉、汪清；伪吉林省的桦甸、磐石、敦化等地。“讨伐”对象确定为：抗联杨靖宇部1500人；金日成部800人；曹亚范部300人；魏拯民部100人；陈翰章、朴德范、崔贤部500人；其他各部300人。①

“讨伐”司令部设于吉林市。这是一次日伪军警宪特完全融为一体的武装暴力行动，非但指挥机关，而且小区分担和“讨伐”行动都是混合进行的。此种做法为过去所罕见。以野副昌德为首的“讨伐”司令部是个庞大的机构，设有：以新京宪兵队特高课长玉冈严宪兵少佐（后为松本满贞）为部长的宪兵部；以伪治安部警务司长植田贡太郎（后为谷口明三）为部长的警察部；以伪军第二军管区顾问黑石中佐为部长的满军联络部；以伪吉林省检察厅日本人为次长的法院联络部；以伪满国务院参事官宗敏雄为部长的行政联络部等。此外，更重要的是以关东军作战参谋北部邦雄中佐任部长的参谋部，该部不仅实际指挥着按如下配置的日伪军，而且直接统辖日军游击队、特设队、工作队，和日伪警宪特别工作队，其中包括长岛工作班和曾在三江“特别大讨伐”中大肆活跃的伪警田中特别工作班。

① 以上抗联部队的划分和各部人数均据日方资料。

至于日伪军的配置，独立守备队的分布是：通化、濛江为第五大队，大队长古见中佐，约1000人；延吉为第二十一大队，大队长布上中佐，约1000人；宁安、和龙为第九大队，大队长小林大佐，约1000人；敦化为第八大队，大队长弘德中佐，约600人；吉林、长春为第七大队，大队长木崎中佐，约800人。伪军有：伪吉林省的步兵第二旅，步兵第五旅；伪间岛省的步兵第十五团，步兵第二十团；伪通化省的步兵第六旅，混成第七旅，他们分别同日军配置在各该地区。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大讨伐”中，伪警察队队伍异常庞大，并被充分利用。在伪吉林省境内参加“讨伐”的伪警察队，达3100人，其中本省警察队6个，1400人，其余为外部支援的伪警察队。^①伪通化省的警察大队共有10个，包括臭名远扬的程斌大队，合计约2600余人。各伪警察大队和日伪军一样，被分配在各个小区进行游击围剿，但不以省界为限。

这场武力围剿的实际指挥者北部邦雄，在三江“特别大讨伐”中曾实际指挥伪军。此次野副“大讨伐”所实施的战术，是所谓篋虱战术，它分为发现、引诱抗日军，和对抗日军进行长追、堵截两个方面。具体作法就是：除利用飞机和了望哨外，冬天则尽量利用雪地足迹进行侦察和追剿；无论何时，只要发现抗日军踪迹，即长追到底，不给喘息之机。因此，“讨伐”行动以小部队游击为主，大部队主要从事警戒和封锁。1940年5月，北部邦雄还将其炮制的引诱袭击抗日军的11条办法，正式通令各“讨伐”部队执行，这就是：按各县联防区分配各游击队担当区；游击队

① 伪中央警察学校200人，伪奉天省警察队500人，伪滨江省警察队500人，伪森林警察队500人。

和专门从事夜间警备的警防队，白天尽量减少勤务进行休息，以便夜间处于随时出击的态势；夜间接近抗日军可能夜袭的部落，或潜伏于抗日军可能经过的要道；故将某些村落警备撤除以诱致抗日军；在引诱抗日军的部落内潜伏尖兵，遭袭击时用电话或烽火报警；研究抗日军袭击方向和退却路线，以一部迎击，以主力扼制其退路，一举歼灭；谋求一切方法欺骗和引诱抗日军，等等。^①配合这一套毒辣战术的是残酷的“治本”。光是奴役群众修筑的所谓警备道路，即达960公里，包括在原始森林里开辟360公里道路。大规模归屯并户，建立“集团部落”。在“讨伐”区内，还建立了80个警防所，日以继夜监视抗日军民。^②此外，伪行政机关禁止群众向抗联活动区移送物资；协和会进行反共宣传，强迫人民为“讨伐”游击队服劳。

日本侵略者还认为，单是武力“讨伐”只会“像割草那样，不能深入覆灭敌人阵营”。所以，还妄图“拔”抗日军之“根”，“塞”共产党之“源”，实行所谓“文化讨伐”，亦即破坏共产党的地下工作、外围团体和寓于革命群众中的所谓“通匪网”。此类镇压，既施之于群众，也以伪军、伪警为目标。指挥这种“文化讨伐”的是，司令部中的参谋部长北部邦雄、宪兵部长玉冈严、警察部代部长田中要次、伪新京高等检察厅绪方检察官等。自1940年3月起，他们以“吉林会议”为名，每月1日和15日交流情况，统一行动部署。

① 1940年5月25日《野副讨伐队参谋北部邦雄关于当前讨伐方法及其他问题的通知》。《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522～525页。

② 1940年9月5日野副昌德在东南部地区治安联络会上讲话。见1940年9月11日延吉宪兵队长给关东宪兵队司令官报告，延宪第470号。

成立于1939年10月的野副“讨伐”司令部，至1941年8月19日宣布解散。为时近1年半的血腥“讨伐”，先后发动两个围剿高潮：1939年10月至1940年2月；1940年10月至1941年2月。成为此次“讨伐”主要目标的抗联第一路军，早在“讨伐”开始大约1年后，1940年9月5日，“讨伐”司令部即宣称，已歼灭大半，射杀和抓捕2500人。^①这个“战果”虽不无夸大之嫌，但是抗联确也遭受巨大损失。特别是成为“讨伐”“主要目标”的抗联领导人的牺牲，其损失是无法弥补的。由于部队连遭损失，到1940年初，杨靖宇直属部队只剩60余人，他当时拟离开濛江西部林西，向东与其它部队靠拢，但遭敌人阻击。1月下旬，警卫旅一团参谋丁守龙被捕叛变，得知杨靖宇行踪的日伪“讨伐”队更加猖狂。连续出动飞机配合陆攻。2月2日，杨靖宇等只剩16人；2月10日左右，又减员至12人；及至2月15日，伪通化省警务厅长岸谷隆一郎指挥崔（霄峰）、程（斌）、唐（振东）、崔（志）警察大队和五斤顶子森林警察队开始猛攻时，杨靖宇等只剩8人，且杨已身患重感冒。但杨等仍顽强抵抗，交战时杨靖宇奋力击毙伪警察崔（霄峰）大队长和伊藤警尉。但终因寡不敌众，于16日凌晨3时30分，被迫退至濛江北大山村庄东3公里处。是时杨靖宇已经负伤，在退却经过的白白雪地上，敌人清楚地发现了他点点滴滴的鲜红血迹。2月18日，杨靖宇身边仅存的两名战士，在濛江县东6公里的大东沟附近向村民购买粮食时，又被当地警防队和特搜班所击毙。于是，岸谷所指挥的伪警察队，对杨靖宇只身一人加紧封锁，还曾派1名不携粮食的“樵

^① 据1942年1月5日伪治安部参谋司：《满洲共产匪团概况》治安参二匪情第一号载：射杀1282人，诱扣1040人，逮捕896人。

夫”进山劝诱，但被拒绝。2月23日，杨靖宇只身转至濛江县第一区保安村，路遇打柴者赵连喜等4人，该4人欺骗杨说回村为杨取面粉和棉鞋，实际于当天下午3时到濛江县城警察署做了报告。这时伪通化省各警察队正向朝抚公路以北地区搜索杨靖宇。得知情报后，伪通化省警察队本部的西谷警佐等21名被派往现场。他们在保安村南约1公里的地方下车后，由告密者赵连喜带路，沿三道濛江河向七四三高地前进，在高地前两公里处发现山中小房，遂兵分两路包抄前进，右翼前进100米发现山寨和杨靖宇，交战20分钟，杨靖宇壮烈牺牲，斯时杨仍两手持枪，说明他战斗到最后一刻。后经叛徒程斌等辨认，确认牺牲者正是杨靖宇。^①

杨靖宇牺牲，敌人欣喜若狂。但抗联一路军在副总司令魏拯民领导下，继续坚持战斗。1940年4月起，抗联第一路军所属警卫旅和3个方面军，均开始向北部突围，并取得一些胜利。但因野副“大讨伐”仍在加紧进行，斗争日趋困难。魏拯民的健康也更加恶化，不得不离队转移到桦甸县夹皮沟牡丹岭密营休养。战斗在敦化一带的第三方面军指挥陈翰章，也于1940年12月8日的镜泊湖南湖头小弯弯战斗中壮烈牺牲。3个月后，1941年3月8日，久病的魏拯民终于逝世。此时，不但抗联第一路军，整个抗日联军的抗日游击斗争都转入低潮。

从大连放火团到“一二·三〇”

日本帝国主义杀伐镇压虽然以中国共产党和抗日联军为重

^① 1940年8月6日伪通化省警分厅关于枪杀杨靖宇经过情况的报告，通省警特密第1167号。《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4卷，“东北大讨伐”，第557～560页。

点，但是不限于这个重点。随着时光的流逝，日本侵略者为了维护江河日下的殖民统治，把一切抗日爱国组织、各种形式的反抗者，以致一般无辜的黎民百姓，统统置于法西斯高压统治之下，概莫能外。前章已经谈及，为了强化白色恐怖统治，1937年行政大改组时，不但实行伪军伪警的统一，而且建立了实行所谓“秘密战”的盖世太保组织——伪保安局。时至1940年，关东宪兵队又成立了专门从事所谓“思想防卫”的思想宪兵队，它把1935年以来关东宪兵队所实行的“思想对策”进一步组织化了。^①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空前觉醒，抗日救亡运动如火如荼。深受激励与鼓舞的东北各阶层人民，也普遍奋起，采取各种形式，打击侵略者，推翻殖民统治，争取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大连抗日放火团的斗争就是典型的一例，他们的斗争也受到日本帝国主义极其残酷的镇压。自1937年起，尤其在1939年前后，日本直接统治的大连地区，连续发生多起大火。日本报纸声称，到1940年起火事件达百余起。光是大连港区仓库和露天堆放的军用物资和非军用物资，被火烧二三十次。此外，如满洲石油会社工厂、关东军被服仓库、大连机械厂、大连满铁工厂、东洋木材工厂、市内油坊、特许品制造厂等都发生过大火。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天津和青岛等地。日本侵略者很快便认为是有组织的谋略放火。关东军曾派特别侦探机关“八六”部队前往侦破，但无结果。于是，关东宪兵队司令部警务部长齐藤美夫伙同关东军司令部第

^① 1940年5月30日的《思想宪兵队编成要领》规定，思想宪兵队专门掌握思想对策业务，而一般宪兵队主要担任军事警察及防谍。思想宪兵队是秘密组织，“以特别工作为原则”，一般宪兵队给以秘密协助。思想宪兵队150名，每名宪兵使用“工作员”2名，共300名；配备宪补、宪兵补200名，他们每名使用“工作员”1名，共200名。思想宪兵队本部以下设7个分队，设于各大城市。

二课人员亲往大连坐镇，指挥当地警宪进行大规模的搜捕。

日本租界地关东州，设有庞大的警察机构，光是警察署就有9个。为统一领导侦破“谋略放火”，关东厅警察部于1938年4月成立了130多人的特殊警察队；在警察部内还设立了特别班，负责化验放火药品，研究搜查方法。1938年8月，从关东厅警察部到各警察署再到各工厂企业，层层设立防谍委员会，强化特务侦查活动。他们在日本宪兵队的实际指挥下，随着“起火”事件的不断发生，而将恐怖引向各个角落。1938年4月，甘井子石油会社工厂起火，宪兵队和大广场警察署派人前往搜捕，工人们全被集中在石油工厂排成一排，然后逐一被命令从工厂小门出去，出去时还必须向停在那里的小汽车注视，两面站满的警特与汉奸，查颜观色，认为可疑立即逮捕。同年6月，港区一二四、一二六、一二八、一三〇等军用仓库起火，200多名工人被捕。码头工人杨天恩竟因仓库起火先后被捕3次。1939年12月，港区一三七仓库起火时，水上警察署又逮捕了二三百名工人。1940年农历正月15日，日清三泰油坊起火，大广场警察署将油坊的帐房权作临时审讯室，长达两个多月，不许工人出门，最后逮捕70多名工人。由于抓捕的人过多，各拘留所都已塞满，于是在关东厅后面特意赶建了1个圆形监所。据统计，从1937年到1940年，日本宪警因起火而抓捕了2000多名工人与居民。除公开的搜捕外，日本警宪还广泛使用特务手段。特别对大连港区，那里不但聚集着数以万计的码头工人，而且是火事频发的场所，所以成了特务侦察的主要对象。日警特搜班乔装满铁社员混迹于码头工人中间，还收买几十名工头充作耳目。最后终因1名小工头出卖放火团情况，而使敌人得了手。1940年夏，抗日放火团成员先后被捕。搜捕从大连扩及到复县、沈阳、山东、天津和上海。日本警特因逮

捕放火者洪德锡不得，竟株连其亲属17人，相继被捕。最后，1942年3月15日，日本关东地方法院竟判决21人为各种有期徒刑，11人为死刑。加上刑讯致死的共有48人命归黄泉。被判处死刑者，日本帝国主义最后在旅顺监狱用绞刑将之置于死地。但是，以纪守先为首的抗日放火者威武不屈，英勇就义，表现出了中华民族必将战胜侵略者的伟大气概。纪守先最后曾回答侵略者称：“你们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我认为你们很快就会失败完蛋的！”^①

大连抗日放火团事件表明，普通工人和城镇居民，已成为战时逮捕、镇压的对象。情况还不只于此，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甚至还有手持枪杆子的伪警、伪军也越来越成为日伪强化统治的眼中钉。这也是事属必然。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日趋扩大，中国各阶层人民迅速觉醒。这种势态体现在武装集团的伪军中，自然就使斗争显得格外激烈。“七七”事变后，伪军第五军管区奉命将驻滦平的第五教导队编为热河支队，随关东军东条兵团西进察绥。支队长为原教导队长朱家训少将，实权则掌握在日本教官相马中佐手里。随同支队司令部活动的是原教导队步兵第一团的第一、二营。1937年8月中旬，热河支队先头部队骑兵已突入张家口并转趋东南，指向宣化，支队司令部也已抵达罗文峪。8月17日，中国军队第八十四师1200人急袭支队司令部，朱家训成了中国大刀队的刀下鬼，相马中佐也被砍的稀巴烂。实际上，当第八十四师大刀队冲入时，担任警卫的两个

① 以上参考1952年5月30日旅大市人民检察署关于前日寇关东州厅警察、宪兵捕杀抗日放火人员及和平居民的罪行调查报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8卷，“东北历次大惨案”，第291~316页。

营全部反正，在他们的引导下，中国军队急袭成功。可当时日伪报纸只报导朱家训战死，却只字未提两个营伪军临战反正。同样情况也发生在靖安军。1937年8月，靖安军的司令部、两个歩兵团、骑兵团、炮兵团奉命调到热河丰宁地区，亦准备随同东条兵团西犯，8月21日靖安军司令藤井重郎少将在第一团团长山崎积上校引导下视察第一机枪连阵地时，被该连山西籍中士班长李玉峰用匣枪击毙。因而藤井也成为“战死”者，山崎积继任其职。在朱家训、藤井重郎死后不久，被派三江“特别大讨伐”的伪军混成第二十二旅的第二十九团，即赫奎武团发生兵变。起因是，参加“讨伐”的伪军本身被整肃，不堪忍受的第二十九团官兵在赫团长率领下，携大量武器弹药，准备加入抗联第八军。后来赫团的数百人虽被招抚回队，但此事对伪军的震动很大。

在赫奎武团兵变的几乎同时，依兰县三道河伪森林警察队，在队长李文彬率领下起义参加抗联第五军，并携带不少武器。1939年5月下旬，又有方正县伪警察队100余人起义。伪三江省警务厅村上警备科长到现地指挥，依兰、通河伪警察队参加追杀。最后追击中俘获的约20人，和特搜班抓捕的约10人，均遭杀害。1940年1月，桦川县八虎里伪警察“讨伐”队70余名队员，亦在队长率领下杀死日本人警察后起义，向富锦方面转进。伪三江省警务厅长岛崎在命令桦川、富锦两县警察队进行堵截的同时，还亲自带伪警察队追剿。时因天降大雪，起义部队留下脚印，遭到围歼。最后队长等半数起义者战死在山中，另一半被俘，其中5名被残酷处死。

在1939年5月爆发的诺门坎战争中，先后被派上前线充当炮灰的伪军部队有：伪军第三军管区教导队长石兰斌指挥的步、骑1个团；伪兴安北警备军司令官乌尔金所辖4个骑兵团；伪兴安

师师长野村登龟的骑兵和炮兵团。结果于1939年7、8月，大批溃退与逃亡，有的还逃往苏联。伪兴安军奉命采取强迫离队者归队的政策，先后收回数百人。但在查布干庙有田菊保率领的17名战士坚不归队。伪兴安军顾问金川耕作和参谋长德永恭助亲率伪军1个连，将其全部射杀。与此同时，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命令各国境分队竭力搜捕正在外逃和企图外逃的伪军。到1941年5月，共捕到24名投入齐齐哈尔陆军监狱，后交由伪军第三军管区，通过军法审判，以违背“军机保护法”的罪名，判刑或处死。

日本帝国主义对伪军警镇压之残酷，莫过于王岗事件的镇压。事件发生在北满重镇哈尔滨附近，并与三肇事件并发，影响很大，震动了整个伪军系统。王岗位于哈尔滨之南，是伪满新建的航空兵基地，那里驻有伪军第二飞行队，共两个连。1941年1月4日，不堪日本军官虐待的全队人员，杀死日本人连附，携带机枪4挺、步枪80余支、手枪10支，毅然起义。当时日伪军警正为三肇事件而大逞凶狂。王岗起义部队亦被追击到三肇地区。1月5日，起义部队在肇东县榆树林（肇东县城南13公里），遭关东军滨江防卫司令部所辖日军2个大队和伪军第二十五团“讨伐”队的包围。结果，被射杀30名，被俘45名，10名逃散。^①后来，被俘者经军法会审，也大都处死。不仅如此，家属亦受到株连，数以百计的无辜者遭受各种迫害。伪军军法部门经过审讯还认为，该事件与国民党地下组织策动有关。于是，白色恐怖袭进伪军军事机关，甚至宪兵中间，开始抓捕伪军中的国民党嫌疑。

^① 1941年4月17日关东宪兵队司令部关于王岗事件的通报，关宪高第348号。《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第8卷，“东北历次大惨案”，第361~368页。该件正文中载起义者共85人，被俘45人；但在附表中，起义者共84人，被俘44人。另外据该件载，起义者夺取的武器，有机枪2挺、手枪12支，步枪120支，刺刀100把，军用卡车1辆。

东北地区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抗日活动始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已有较大发展。国民党地下组织的抗战活动，是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敌人同样构成威胁。他们主要活动于铁路交通沿线和较大城镇，且因系统、成分较为复杂，易遭破坏和镇压。1941年7月25日，以铁路员工为主体的秘密组织——“执委部”在齐齐哈尔成立。核心成员是1937年成立但不久又停止活动的倾向国民党的秘密组织“七人组”成员。“执委部”也沿用“七人组”的活动方式，开会时恭读《总理遗嘱》。但他们愿意接受抗联三路军的领导。1941年9月至10月，抗联三路军九支队参谋长郭铁坚和大队长曹玉魁率领的30余人，在讷河县西北的伪兴安东省莫力达瓦旗多西浅附近，遭驻昂昂溪日军田中部队白凡“讨伐”队的袭击，郭、曹牺牲。敌人从郭的身上搜出“执委部”的汇报材料，从而揭开了搜捕国民党地下组织的序幕。关东宪兵队司令部特调集昂昂溪、嫩江、白城子、阿尔山宪兵分队的力量，以齐齐哈尔宪兵队为主，组成特别搜查班，按日军“讨伐”队之名，以“田白工作”为代号，在1941年11月9日至15日进行了全面大逮捕。逮捕范围扩大到齐齐哈尔、哈尔滨、长春、吉林以及关内的济南等地。但在125名被捕者中，绝大部分是无辜群众。最后被判处各种徒刑者38人，其中3人被屠杀，他们之中大部分是铁路员工。

在那之前，1941年5月，齐齐哈尔宪兵队即通过密探得知，市内潜伏有国民党地下工作者。后从“田白工作”的高压逼供中又确证此事。所以，“田白工作”告一段落后，从12月8日起，齐齐哈尔宪兵队长星实敏根据线索，组织侦察班，并按自己的姓名以“贞星工作”为代号，突击进行侦察。此后不到10天，12月17日即开始大逮捕，在齐齐哈尔逮捕100多人，在锦州逮捕40多

人，最后有40多人遭到包括死刑在内的各种残酷惩处。^①例如：伪锦州铁路警护队在刑讯周振寰及被株连的周的怀孕7个月妻子时无所不用其极：“竹签刺指甲”、“火烧全身”、“灌辣椒水”“竹籤刺阴道”、“猪鬃通尿道”、“滚钉笼”、“坐老虎凳”，等等。最后，周振寰连一具完尸也未曾留下。

“贞星工作”事件和继而发生的“一二·三〇”事件是套在一起的。或者说前者是后者的组成部分。当“贞星工作”立案并很快侦察到国民党地下组织“遍布全满”时，与日伪警特的另一条线侦破汇合到一起了。这就是，1940年6月伪首都警察厅在搜查伪新京税捐局的所谓渎职事件中，偶然发现了国民党地下活动的线索。由于国民党派系复杂，领导多头，一人与诸多组织发生联系，结果大批组织暴露，诸如东北协会、东北调查室、东北抗战机构、铁血同盟团，以及成为“贞星工作”目标的北宁铁路党部，等等。对此，1941年12月30日，日伪警特进行了一齐大逮捕，故被称为“一二·三〇”事件。从组织构成上看，“贞星工作”事件和“一二·三〇”事件，青年学生和文化界人士占很大比重。他们之中，有的是国民党地下组织成员，也有的希望加入共产党组织的信仰共产主义者，例如以“恢复党”之名所组织起来的部分青年便属于此类。不过，“一二·三〇”及其以后的历次相关大逮捕中，被捕者多数是国民党或倾向国民党的爱国青年。需要指出，在这些大逮捕中，特别是“一二·三〇”的大逮捕中，叛徒宋一夫等人为虎作伥，扮演了极端可耻的罪恶角色。

“一二·三〇”事件，是伪满时期重大惨案之一，先后有500余人被捕。只是各伪警察机关送交伪都新京、奉天、哈尔滨、锦

^① 因“贞星工作”事与“一二·三〇”事件套在一起，无法划分两案界线，故逮捕数字说法不一。

州、齐齐哈尔等5个伪高等检察厅的就有239名。^①但如果与伪满末期的几次大逮捕联系起来，“一二·三〇”事件，还属于大规模镇压国民党地下抗日爱国活动的先奏。

^① 1942年12月7日伪治安部通报，治警特密发第1040号。